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14

中日《四書》 詮釋傳統初探（上）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俊傑◎編

詮釋傳統初探（上）

中日《四書》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俊傑◎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上）／
黃俊傑編 ---初版---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2004〔民93〕
259面；15 * 21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01-7848-5 (上冊：平裝)

ISBN 957-01-7849-3 (下冊：平裝)

1. 四書- 研究與考訂

121.217

93012996

統一編號 1009205588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14

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上）

編 者：黃俊傑

策劃者：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陳維昭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地 址：臺北市 106 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 話：02-23630231 轉 3914

傳 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2004年8月初版

ISBN 957-01-7848-5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策劃)

(按姓名筆劃排列)

召集人	李弘祺	紐約市立大學／臺灣大學
主 编	黃俊傑	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
編輯委員	Benjamin A. Elman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子安宣邦	日本大阪大學
	古偉瀛	臺灣大學
	甘懷真	臺灣大學（常務編委）
	李明輝	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
	吳文星	國立師範大學（常務編委）
	吳展良	臺灣大學
	高明士	臺灣大學
	陸 揚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常務編委）
	張隆溪	香港城市大學
	張寶三	臺灣大學
	陳昭瑛	臺灣大學
	楊儒賓	國立清華大學（常務編委）
	劉述先	中央研究院
	鄭吉雄	臺灣大學（常務編委）
	蔡振豐	臺灣大學（常務編委兼執行編輯）

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

目 次

上 冊

導言.....	黃俊傑	1
〈理論與背景〉		
壹、 詮釋學與修辭學.....	洪漢鼎	21
貳、 詮釋、修辭與論辯溝通.....	張鼎國	41
參、 Canonical Comprehensiveness and Heretical Partiality	John B. Henderson	65
〈論語與孟子的詮釋〉		
肆、 何晏《論語集解》的思想特色及其定位.....	蔡振豐	81
伍、 Making Sense: Wang Bi Commentary on the <i>Lun Yu</i>	Rudolf G. Wagner	109
陸、 朱子對《論語·顏淵》「克己復禮」章的詮釋 及其繼起爭議.....	張崑將	159
柒、 元田永孚的「君德輔導」與論語解釋： 關於《經筵論語進講錄》的考察.....	陶德民	213
捌、 二程與朱子對「仁」的詮釋及其思想史意義.....	白奚	237

下 冊

〈大學與中庸的詮釋〉

- 玖、 善與至善：論朱子對《大學》闡釋的一個向度 郭曉東 261
拾、 論朱子在對《中庸》的詮釋過程中受呂與叔的影響及其對呂氏之批評 郭曉東 293
拾壹、 從朱子與陽明之《大學》疏解看中國的詮釋學 馮達文 325
拾貳、 大鹽中齋的《大學》詮釋 荻生茂博 347
拾參、 貝原益軒對《大學》的解釋 辻本雅史 389

〈朱子與宋明四書詮釋〉

- 拾肆、 程頤與經典詮釋 黃勇 409
拾伍、 閱讀與理解：朱子與施萊爾馬赫詮釋思想之比較 潘德榮 435
拾陸、 朱子對理解之蔽的認識—兼論中西闡釋理論的一項本質區別 李清良 453
拾柒、 明代書院與儒學詮釋的平民化 鄧洪波 475
拾捌、 論袁宗道的《四書》詮釋 周 群 509
拾玖、 Classical Reaso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Civil Examination Essays Benjamin A. Elman 537
人名索引 609

導　　言

黃俊傑

一、

這部書所收錄的十九篇論文，都是台灣大學《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劃所主辦的歷次學術研討會中，研究計劃主持人以外之學者所發表論述中國與日本儒者的《四書》詮釋的論文。除了前三篇論文探討經典詮釋相關的理論問題之外，其餘十六篇都討論中國與日本思想家對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的詮釋，現在編為專書出版，我想就各篇論文的要旨及其所涉及的問題略加說明，以作為讀者閱讀的參考。

本書論文共輯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理論探索》收錄三篇論文，從不同角度討論經典詮釋的理論問題。第一篇論文作者洪漢鼎是研究詮釋學的著名學者，曾翻譯高達美（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¹他在這篇題為〈詮釋學與修辭學〉的論文中，循高達美的思路，指出詮釋學與修辭學都重視實踐性，因為詮釋學與修辭學都不是一種邏輯理論，而是一種實踐能力。

¹ 洪漢鼎：《真理與方法》，第1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第2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洪漢鼎：《理解的真理：解讀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2 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

洪漢鼎指出：哲學詮釋學揭示真理的原始經驗。這種原始經驗常常被生活世界中的科學主義和客觀主義所掩蓋。第二篇論文是張鼎國的〈詮釋、修辭與論辯溝通〉。張鼎國在本文中所探討的是當代語言學轉向之後所出現的一些新的哲學課題。他首先檢討當前哲學思考上語用側面大幅度提昇之後，傳統對語言活動各個面向的看法所出現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又反過來影響以後哲學論述的方向和性格。接著，John B. Henderson在第三篇論文中，探討「經典的周延性」與「異端的偏頗性」之相關問題。Henderson曾有專書討論中國宋明理學、伊斯蘭教、猶太教與早期基督教中「正統」與「異端」的建構之相關問題。²最近也與我合編討論中國歷史思想中的時間概念之專書。³這篇論文主旨 在於指出，在許多不同的宗教或思想傳統中，經典都被認為內容周延而完整，包括所有的真理、價值甚至一般知識，他稱這種現象為「經典的周延性」。他這篇論文就是針對何以諸多不同的傳統都有這種「經典的周延性」的共識，提出他的解釋。

二、

本書第二部份《論語與孟子的詮釋》收錄的五篇論文，都討論不同時代的中日學者對於《論語》與《孟子》的解釋。《論語》一書在中國之地位自不待言，東傳日本之後十七世紀日本

² John B. Henderson,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Neo-Confucian, Islamic,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³ Chun-chieh Huang and John B. Henderson eds., *Notions of 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Forthcoming).

儒者伊藤仁齋（維楨，1627-1705）譽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⁴更成為近三百年來日本各界人士必讀之經典，影響深遠。本書第四篇論文是台大中文系蔡振豐的〈何晏《論語集解》的思想特色及其定位〉。蔡振豐對魏晉思潮頗有研究，曾以《王弼的言意理論與玄學方法》為題，撰寫碩士論文。⁵他在本文中首先指出如果僅從「始有玄言」的角度看《論語集解》，將無法掌握《論語集解》的特色及其影響。他指出：從「以人合天」的思想而言，何晏（A.D. ? -249）《集解》並不摻入老莊思想。就《論語》一書的詮釋而言，由鄭玄（A.D.127-200），何晏到王弼（A.D.226-249），他們詮釋的差異建立在對「天道」的不同理解之上，在「以人合天」的架構下，也由宇宙論式思考逐漸趨向於形上學的思考。

蔡振豐分析從何晏《論語集解》到王弼《論語釋疑》的思想發展，他認為：從儒學的角度而言，何晏《集解》雖不能對德性根源問題提出說解，但大抵仍保有儒者對德性問題的重視。王弼《釋疑》則呈現為形上學的思考，完全揚棄宇宙論中心的思維模式，而將重點放在形上之「無」的把握上，這種思考使儒學的內涵完全失卻。蔡振豐的說法與Rudolf G. Wagner可以互相發明。Wagner所撰第五篇論文，主旨 在於分析王弼對《論

⁴ 伊藤仁齋：《論語古義》，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詮釋全書》（東京：鳳出版，1973），第3卷，論語部一，〈總論〉，頁4，亦見於：伊藤仁齋：《童子問》，收入：家永三郎等校注：《近世思想家文集》（東京：岩波書局，1966，1981），卷上，第5章，頁204。龜井朝陽（1773-1836）更說：「人之躋《孟子》配《論語》者，未知仲尼之為宇宙一人者也」。參看：龜井朝陽：《家學小言》，收入《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1978）第6冊，頁1。

⁵ 1993年台大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語》的解釋。Wagner是當代德國著名漢學家，任教於海德堡大學，撰有專書討論王弼對《老子》的解釋。⁶本文是他有關王弼思想研究的延續。Wagner在本文中指出，王弼發展出一套脈絡化而深奧的解讀《論語》的策略。他認為，王弼解釋《論語》的關鍵在於扣緊孔子描述聖人境界時，所顯示的對於語言的不信任的態度。王弼從這個角度出發，重建《論語》中的孔子形象，重新解讀孔子思想。

《論語》全書勝義紛披，諸多章節觸及重大哲學命題，其所引發之辯論或詮釋之發展，在東亞儒學史上深具意義，例如：《論語·學而·1》「學而時習之」章、《論語·為政·4》「五十而知天命」章、《論語·為政·16》「攻乎異端」章、《論語·里仁·8》「朝聞道」章、《論語·里仁·15》「一以貫之」章、《論語·公冶長·13》「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章、《論語·泰伯·8》「興於詩」章、《論語·先進·12》「季路問事鬼神」章、《論語·顏淵·1》「克己復禮為仁」章、《論語·子路·18》「直躬者」章、《論語·季氏·7》「君子有三戒」章等章，在東亞《論語》詮釋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的地位，中日韓各地儒者對上述《論語》各章的解釋及其變化，常常可以顯示解釋者的思想傾向與時代思想氣候的變化。本書第六篇論文是張崑將的〈朱子對《論語·顏淵》「克己復禮」章的詮釋及其爭議〉。張崑將曾研究德川日本思想史上的「忠」與「孝」的概念，並撰成專書出版。⁷張崑將這篇論文以朱子（晦庵，1130-1200）對《論語》

⁶ Rudolf G. Wagner, *The Craft of a Chinese Commentator: Wang Bi on the Laozi*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⁷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台北：喜瑪拉雅研究

「克己復禮」章的解釋作為主軸，分析朱子之後中日儒者批判朱子的解釋時所提出的解經原則，並指出後儒的解經方法必然誤解朱子對此章的解釋，故皆無法進入朱子學的詮釋之環，而且在他們企圖瓦解朱子詮釋典範中的解經原則之後，仍然無法解決經典解釋的歧異性。張崑將首先闡釋朱子「克己」、「復禮」、「為仁」的三個關鍵思想內涵，他認為除了從《論語集註》了解此章意涵外，尚須從朱子有關此章之著作來掌握朱子關於此章的整體思想，才不致誤解朱子的關鍵思想。張崑將接著舉出中日三位儒者作為批判朱子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清儒戴震（東原，1724-1777），以及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儒者荻生徂徠（茂卿，1666-1728）、懷德堂儒者中井履軒（1732-1817）等三位儒者均批判朱子。中日三位儒者均認為朱子解經時，違背了使用語言的原則。

《論語》全書之中，言「仁」者凡五十八章，「仁」字在《論語》共出現 105 次，「仁」確是孔學之關鍵。本書第八篇論文白奚的〈二程與朱子對「仁」的詮釋及其思想史意義〉一文，就是以孔學中的「仁」作為主軸，探討二程與朱子對「仁」的解釋。白奚從三個角度析論程朱對孔子「仁」學的發展：第一是「以體用言仁」：程朱以體用言仁，通過對「性情」、「動靜」、「已發」、「未發」等理論問題的深入探討，不僅發孔孟之所未發，將孔孟仁學中潛藏的意義充分地展現出來，而且也使孔孟仁學中某些籠統和模糊的表述更加明晰，並由此澄清很多誤讀。第

發展基金會，2003），該書原係作者在 2002 年向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提出的博士論文，原題：《日本德川時代「至孝」與「純忠」思維的典型》，經修訂後以專書形式出版。

6 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

二是「以生意言仁」：通過這種創造性的詮釋活動，仁的價值被進一步提昇，由人之道提升為天之道，成為天地化育萬物的內在動力。程顥以生生言仁，賦予自然生命以道德的意義，這個理論方向為程顥所繼續。注重發明一個「心」字，是程顥以生意言仁的一個特點。以生生之意言仁，也是朱子論仁的一個重要方面，朱子對此論述極多，其重視程度超過二程。朱子以生意論仁，大體與程伊川相近，也是著眼於宇宙萬物和人之心性兩個方面。第三是對「心之全德」的論述：程伊川以頭與手足的關係喻仁與其他德目之關係，十分形象而又確切地突出了仁的統領諸德的特殊地位，在他看來，仁的這種地位和作用，只有在與其他諸德的關係中才能顯現。朱子並進一步進行具體論證，使之更為明確和豐富。朱子的特殊貢獻，在於提出了「全德」這一概念以突出仁的地位。朱子還以「生生之意」加以詮釋，還借用氣化流行的思想論述「全德」之仁。透過程朱在詮釋仁與諸具體德目的關係時，所使用的諸如「兼」、「統」、「貫」、「攝」、「涵」、「載」、「包」、「管屬」、「宗」、「元」等字眼，程朱確立「仁」的道德總綱的地位。

《論語》東傳日本以後，對日本思想與政治影響甚大，最近三百年來對《論語》提出詮釋的日本儒者可謂指不勝屈，其中十九世紀的元田永孚（1819-1891）對明治時代影響甚大。本書第七篇論文作者日本關西大學教授陶德民研究德川儒學與日本漢學，均有專書出版。⁸陶德民這篇論文就以元田永孚的日記和《經筵論語進講錄》為基礎，探討明治時代學術與政治的關

⁸ 陶德民：《懷德堂朱子學の研究》（大阪：大阪大學出版會，1994）；《日本漢學思想史論考》（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99）。

係以及其對經典闡釋所發生的影響。元田永孚是年輕的明治天皇（1852-1912）的儒學教師，自 1871 年起服務二十年，深受天皇信賴。元田永孚為矯正當時政府的急進西化政策，在 1878 年前後兩年之間，和他在宮中的同僚發動一場「天皇親政運動」。元田的「論語進講」於 1878 年 1 月至 4 月之間進行，其目的在於培養天皇「修德政治之根本」。從《進講錄》的內容可以看出，元田永孚以「內聖外王」作為其「君德輔導」的基本目標，以「仁者愛人」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方針，以「國體論」作為憲法欽定的主要依據，以灌輸忠孝道德為學校教育的首要任務。雖然「天皇親政運動」未能成功，但天皇在 1890 年〈教育敕語〉公布和憲法實施時，終於被神聖化。元田永孚堅持以儒教為國教的思想和立場，也在他所參與起草的〈教育敕語〉中獲得部分的實現。

三、

本書第三部份五篇論文都論述中日儒者對《大學》與《中庸》的解釋。第九及第十篇論文作者郭曉東，在兩篇文章分別討論《大學》與《中庸》的解釋。眾所周知，朱子平生瘁其心力於《大學》，他的「格物致知」說就是經由他的《大學》解釋而建立。⁹郭曉東的第九篇論文的問題意識是：朱子從《大學》

⁹ 近來國外研究朱子與《大學》的論文有：(1) Matthew Arnold Levey, “Chu Hsi Reading the Classics: Reading to Taste the Tao—‘This Is a Pipe,’ After All,” in Ching-i Tu ed.,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p. 245-271. (2) Jonathan R. Herman, “To Know the Sages Better than They Knew Themselves: Chu Hsi’s ‘Romantic Hermeneutics’,” in Ching-i Tu ed., *Classics*

中開發並特別加以論證的問題是什麼？郭曉東指出：朱子詮釋《大學》最根本的一個向度就是《大學》「三綱領」中的「止於至善」。在朱子看來，「至善」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善」，「小學」的工夫成就的是「善」，使人成為一般意義上的人，而「大學」則要人「止於至善」，成為聖人。所謂「止於至善」，既要將人本有的明德推至極致，使人心不受一毫私慾之沾染；又表現應事接物之際體察入微，不僅不受事物千變萬化所左右而保持吾心之貞定，而且更能將事物之方方面面無不安排的妥當合理。同時，要「止於至善」，工夫上要求無所不用其極，一節接一節而止於至善。在層層遞進的工夫論體系中，最重要的是格物致知，它是「止於至善」最重要的保證，朱子詮釋《大學》之所以重視格物工夫，應落實在這一點之上考慮。就此而言，格物的目的不在於博學多聞，而在於實踐領域的「止於至善」，單純以知識論的立場看朱子的格物論恐怕有所偏差，陸象山與王陽明批評「義外」、「支離」等說法也要重新檢討。

郭曉東接著在第十篇論文中，分析朱子對《中庸》之詮釋，既受到呂與叔相當程度影響，又對呂氏之說提出嚴厲之批評。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pp. 215-225.

(3) John Berthrong, "Expanding the Tao: Chu Hsi's Commentary on the *Ta-hsüeh*," in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pp. 3-21. (4) Chung-ying Cheng, "The Daxue at Issue: An Exercise of Onto-Hermeneutics (On Interpretation of Interpretations)," in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pp. 23-44. (5) Kai-wing Chow, "Between Sanctioned Change and Fabrication: Confucian Canon (*Ta-hsüeh*) and Hermeneutical Systems Since the Sung Times," in Ching-i Tu ed.,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pp. 45-67.

但朱子對呂氏之認同與朱子對呂氏之批評具有不同的特色。整體而言，朱子對呂注《中庸》的認同與所受之影響更多的是在對《中庸》文字的訓解注說層面，即「學」（經學）的層面；而朱子對呂氏所不滿者，則主要集中於對《中庸》工夫的表述上，即「道」（理學）的層面。尤其「求中」之工夫，乃呂氏在詮釋《中庸》時所涉及工夫論時的核心觀念，朱子既不能認可呂氏「求中」之工夫說，則對呂氏《中庸》詮釋中凡涉及與此相關之工夫者，如以「效驗」為「工夫」與「德成反本」等觀點，皆有所不滿。。

朱子之註《中庸》，乃博採衆家之長以鑄成一己之新說，所以，朱子《中庸章句》既有得之以程、張諸子者，也有沿襲傳統鄭玄之舊注者，程門諸子之說，也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體現，呂氏僅為一較為明顯之例證而已。然而對於前賢之傳註，朱子並非簡單襲取，而是將其納入新的義理系統之中。因此，朱子之註經，就有兩個層面的考慮：第一，要做到最大程度上與經典文本保持一致，可視為是「學」的層面（經學）；第二，又要透過對經典文本的解讀，以建構一個能夠安頓人生、指導實踐的義理系統，這可以視為「道」的層面（理學）。正是由於有此後一層面的要求，使得宋代的經學型態有異於漢唐經學的傳統形態。

郭曉東認為，自北宋程、張以來之學術傳統，即要求「學」與「道」有其內在之一致性，對經典文本之章句傳註本來就是為了彰顯其「道」的意義。因此，首先，朱子之註經，在透顯文本背後的義理同時，亦非常重視對本文本身正確的詮釋。然而，程、張以來新的詮釋視域下之所謂「經學」，並不是單純對

名物度數的考辨，對文本正確的訓解意味著正確地解釋文本的義理內涵。朱子在經學層面上認同呂氏之說並受其影響者，應作如是理解。其次，在朱子看來，對經典的詮釋，包括對文本具體義理的闡釋，都不能與其總體上之義理系統相違背。朱子批判呂氏「求中」之說，又批評呂氏對終章的詮釋，其所用心者均在於此。

郭曉東的分析方法是先挑出呂與叔明確影響朱子的說法，再分析朱子對呂氏之說的回應。郭曉東分析在朱子的《中庸章句》中，引用二程七次，引用呂與叔五次，引張載四次，引游酢一次，引鄭玄四次，引楊時一次，引侯師聖一次，引沈括一次。郭曉東也指出，朱子大段抄錄呂說論證己說者共四條，他也指出《朱子語類》與《中庸或問》詮釋《中庸》時常採用二程與呂與叔之說。郭曉東的研究方法，近似日本前輩學者大槻信良的方法。大槻信良從《四書集註章句》引用前賢之說之統計，探討朱子治學的因襲面與創新面。¹⁰這種研究方法提供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面向。

第十一篇論文作者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馮達文則分析朱子與王陽明（1472-1529）對《大學》的疏解，企圖回答「中國解經傳統的特質何在」這個問題。馮達文首先指出，《大學》的解釋可能循著兩種不同的路徑：第一是順著《大學》已經開出的形式化與知識化的理路，進一步賦予其主要概念與命題以形式與知識的意義；第二是直接契入《大學》所確認的思想信仰，以

¹⁰ 大槻信良：《四書集註章句に現れた朱子の態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期，1953，頁80-90。

個人的踐行與體驗證成這種信仰。前一個解釋路向為朱子開拓，後一個解釋路向則為王陽明所贊成。馮達文從朱子與陽明的《大學》解釋引出一個問題：既然對同一本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釋，而且有的解釋離本文相距甚遠，我們怎樣判定不同的解釋的有效性呢？馮達文在結論中認為，從《大學》解釋這個個案顯示：對同一文本在同一時代乃至不同時代的不同解釋，所顯示的不是解釋的混亂，而是經由這種不同解釋，而呈現了文本意義的豐富性。

《大學》一書不僅對公元第十世紀以後的中國影響甚大，而且東傳日本以後也深獲扶桑學者之重視。荻生茂博在本書第十二篇論文〈大鹽中齋的《大學》詮釋〉一文中研究日本陽明學者大鹽中齋（平八郎，1794-1837）解釋《大學》的作品《古本大學刮目》。荻生茂博指出：大鹽中齋所著《古本大學刮目》這部書，吸納王陽明以降的《大學》詮釋，並繼承清初考據學的成就。大鹽中齋強烈批判1790年獨尊朱子學的「寬政異學之禁」，他對《大學》的解釋與陸稼書的《四書大全》形同水火。大鹽中齋以後，日本儒學與明末思想之關係日益深刻。

本書第十三篇論文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辻本雅史所撰的〈貝原益軒對《大學》的解釋〉一文。辻本雅史的研究領域是德川時代日本教育史，著述甚豐。¹¹ 辻本雅史在第十三篇論文中，首先指出不能僅從近代教育學之先驅的角度看待貝原益軒（1630-1714）的歷史角色，而應該從「知的現場」與「歷史的

¹¹ 較為重要的專書有：辻本雅史：《近世教育思想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1990）；辻本雅史：「『學び』の復權—模倣と習孰一」（東京：角川書店，1999）。